

天人之际：“巫史”衍生“六艺”

李万堡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 商量百家, 追溯元典, 莫不言“六艺”, 盖“六艺”自古乃治国理政之总纲, 然世人多祖述仲尼删述而鲜及其渊薮。自汉代起, 所论多不出“尊儒崇道”之窠臼, “六经皆史”说已脱而初窥堂奥, 江璩、梁启超与刘师培诸君特为探骊得珠者, “巫史”乃一切文明之渊薮, 概言之, 礼乐文化生于巫史, 衍为“六艺”, 至礼崩乐坏而神祇式微, 政治则以人事为宗, 于是百家蜂起以尽人事而救世。

关键词: 巫史; 六艺; 尊儒崇道; 六经皆史; 神祇式微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1X(2019)01-0041-06

“Six Classics” Derives from “Wizard History”

LI Wan-bao

(Zhujiang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o trac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e has to discuss “six classics”, which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just follow or execute the rules by Confucius and few try to find out its origin. Most of the views of modern about “six classics” can’t beyond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six classics” were all history, which shows their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and taste of the deeper conception of “six classics”. Others such as Jiang Quan, Liang Qichao and Liu Shipai grasp its crucial points that wizard history is the roof of all civilization. To be specific, “six classics” derive from the culture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which comes from wizard history. When the culture enters into the dead end and gods decay, governors have to employ social affairs as the main task of governing, therefore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try their best to propose, argue, discuss or practice their ideas of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Key words: wizard history; six classics;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and advocating Taoism; six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y; gods decay

《庄子·天下篇》评说“天下大乱, 贤圣不明, 道德不一”之后, “道术将为天下裂”, “百家往而不反”, 是为诸子蜂起。所谓“道术”, 集于“六艺”。马一浮说“六艺无所不该”, 此谓元典。“六艺”肇自远古, 渐成三代, 又经西汉特起为数千年群经之冠冕。羲农之始, 文化渐开, 渔兽之养赖于长, 天神之命听

于巫。渐进商周, 载籍日丰, 及周孔六艺乃定。钱穆即以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 又兴私学, 遂以“六艺”本于儒, 即“道术”传于孔而诸子皆出之。然仲尼“述而不作”, 所述乃前代旧典, 后世诸子固然与孔门千丝万缕, 亦与老聃之学盘根错节, 故钱穆视域未远。又有江璩以“六艺”掌于柱

收稿日期: 2018-09-27

作者简介: 李万堡(1959-), 男, 黑龙江方正人,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及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

下,老子栖身柱下,当曰“九流出于史官”,抑或出于老聃,可见江琬视域未去钱穆几何。概言之,老聃、仲尼皆传承而已,若寻绎中华元典渊藪之鹄的,非但近瞩商周衍生之迹,亦当远瞻三代以上。

一、“尊儒崇道”之局限

后学尊儒崇道,各有轩輊。班固所论本于刘歆《七略》,列儒家为《诸子略》之中,虽说以儒家皆传述“六艺”学者,浑言诸家“皆《六经》之支与流裔”,而独崇儒家,又以“六经”分掌各官所属而言“诸子出于王官”,于是“九流十家说”可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遂使百代不离其宗。

江琬以儒家亦出于道家,而道家又出于史官:“班、刘二氏溯诸子之近源,故源各不同,而不知出于古史之官者也。”^{[1]23}百家之学并非并起,而是递嬗相生,若溯其源,实统于史。若谓诸子出于史官,则复落入班固“王官说”窠臼,出于道家、出于儒家皆班固余绪,但江氏以“史”列于诸家之上,其见已远去班固。道术裂变,老聃、仲尼各占枢机,“裂变”之前,天下坟典聚于洛邑,文化浑然,老聃掌柱下,传道德言,无论家派;“裂变”之后,学在四夷,仲尼私塾,百家兴起,各执一端。上古之时唯史独尊,“六艺”皆出史官之手,“黄帝以后,老子以前,上下二千年,唯道家之学扶輿磅礴,得道家之玄虚一派者,为名家,为阴阳家,及后市之清谈家,神仙符篆家。得道家之践实一派者,为儒家。得道家之刻忍一派者,为法家。得道家之阴谋一派者,为兵家,为纵横家。得道家之慈俭朴一派者,为墨家。得道家之齐万物、平贵贱一派者,为农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为小说家。传道家之学而不纯,更杂以诸家之说者,为杂家。是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虽各张一帜,势若水火,而其授受之渊源,实一一出于道家。”^{[1]63-64}江说之要害则在于,道家独尊。

若以老聃、仲尼论之,则道家先于儒家,若以诸子渊源而论之,似不应陷入“九流十家”之窠臼,因此,江琬等显然视域偏狭。司马谈以老聃为道家,并非曰一切史官皆道家。道史混同,江氏之狭;独尊儒学,钱氏之偏。吕思勉说“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而道家实为“纲领”,此论似过。各家学说相互渗透,而老子最早,如说各家学说与老子密切,皆被泽于老聃则不无道理。《周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谓“一致”者,治世之“大道”也;

所谓“百虑”者,诸子之思虑也。诸子抽绎“六艺”,各执一端,即百家也。纵观“道术裂变”之论,庄子最当。班固先说诸子为“六经之流裔”亦与庄子相合,之后又说“诸子出于王官”,似为凿空。后世另有“救世说”“救时说”“政治说”等,皆依心理动机而立论,即值礼崩乐坏、兵连祸结之世,诸子各循“六艺”而求索治道是为“百虑”,而其理论渊源,皆未明所以。

二、“六经皆史”之超越

隋代王通说圣人述史有三:述《书》记“帝王之制备”,治国之文典;述《诗》观“兴衰之由显”,察兴衰之气象;述《春秋》见“邪正之迹明”,考古鉴今。王通所述谓“三经皆史”,后经宋之陈傅良,元之郝经,明之宋濂、王守仁,清之章实斋、龚定庵诸家持而备之,其中当首推王阳明、龚定庵二家。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讨论于此:“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2]此谓《春秋》《易》《书》《礼》《乐》“五经皆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一事两说而已。“事即道、道即事”,“经”即“史”,“史”即“经”,圣人之道寓于圣人之事,故而《春秋》未尝未言道也,实以“史事”而明道体“经”。圣人作经,无非是戒恶扬善,一如圣人存“史”以遗后人,“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此“经”之用,“道”之体。

此后王世贞之说也颇具影响,其《艺苑卮言》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并具体区分六经各文体,或“史之正文”、或“史之变文”、或“史之用”、或“史之实”、或“史之华”。时人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提出“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3]。李贽是提出“六经皆史”的第一人,良史堪为经,秽史则不堪。李贽与人所不同的是揭示了《易》的群经之首地位,《易

经》示人以经之所自出。李说洞见，惜其身后微澜未动，而直至清季章实斋出，或诋或誉，天下纷纭。

章实斋本于诸子出于“六艺”而再倡“六经皆史”：“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其源皆出于六艺。”^{[4]57-58}其一，六艺为纲常，诸子为一隅；其二，诸子出于六艺，而《诗》教为首；其三，知源流而后可知道，而后可折衷百家。实斋之讨论源诸子，厘则百家，实为本论巨擘。章实斋以“六艺”兼该道体云“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老、庄、列为“易教”，邹衍、关尹为“书教”，管、商为“礼教”，申、韩为“春秋教”，杨、墨、尹文、苏、张、孙、吴仅“得其一”而不为“六典之遗”也。章氏此论实源自《庄子·天下》。即为六艺该道，而诸子各得道之一端，故为六艺所该。天下所有著作皆可以归诸史部，《六经》也是圣人特来取此“六史”以垂训世人，子集诸家“其原皆出于史”。

章氏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又详议此题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实斋已明确否定诸子及“六艺”皆出于儒、道二家之说，因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圣人仅以取其为垂训耳。余英时以为有清一代学术，章氏“六经皆史”说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说”最为纲领。清末汪中《左氏春秋释疑》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虽各有专门巫史所掌，后皆归于史官，而其记录渐成《六艺》^[5]。后龚自珍又出惊人之语：“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周之东也，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6]史之外无文字，周之史来自于殷商史官，虽官学而家传，且周之百官莫不联事于史，仲尼删诗书亦于杞、宋之外广征夏、商之史。“诗书”书于竹帛者史，“礼乐”不可以口舌而亦得之于史，此说实因夏商两代史官皆有种种称谓。所谓“经”者，自东周而后始有此说，且《六经》皆周之宗子，即《六经》皆周史之坟典，分司载卜筮、载言事、载礼乐，此等皆口舌所不能传，故一切皆赖于史籍所载。百史司

百事，唯老聃之流为司史之史（柱下史），故龚自珍尊道家为百史之宗主。龚论凿凿，毋庸置疑。不惟上古尊史，其实社稷兴衰，宗族兴亡所系，其纲纪、教化、宗庙、国家无不维史，是谓百官之宗。

章太炎最初深膺“王官”说，后又演讲《论经史儒之分合》曰：“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之史料？……《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学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无可疑。”^[7]太炎此论可谓“六经皆史”之殿军，然“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庸”，其并列儒史，又以“史”为“经”之流裔，不免分类错综，本末倒置，重蹈“尊儒崇道”覆辙。而“六经皆史说”之超越即在于论列史经之序，史官初设乃至三代之世，又何尝曰“经”？“经学”始于西汉，而魏征《隋书·经籍志》目录始标注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并垂范后世，“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新唐书·艺文志一》）。四部体制始立，是故史官所载，仲尼所传之“六艺”皆曰史典当以有据；至于百家私说，后人曰“子”以别于“六艺”亦当有据。

李贽以《易》为首，为“经之所自出”。影响最巨者章实斋以“诗”为首，即“其源多出于《诗》教”。章太炎虽曰“诗”多源于巫祝，“易”亦如是，而终以《易》为群经之首。各见虽异而同曰“皆史”。然傅斯年以为“史”之概念晚出，而“六经皆史”与“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用新名词称旧事物”，于物质则可，于人文则不可。张荫麟曾言以现代自觉的系统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是近今治中国思想史之通病。“史”本“文书记录”者，非同后世史学、史籍，故曰“六经皆史”，难免附会之嫌。后人可以经史子集别类，但春秋以前绝无此称谓。若泛言之，上古史官所记录之文书，后人强称之为“史料”未为不可。总之，“六经皆史”已超越诸子源于儒、道之窠臼，可见庄子所谓之“道术”生于斯、传于斯也。

三、“敬天法祖”巫史之权

刘师培推衍龚自珍“六经乃周史之大宗说”集“六经皆史论”大成曰：“六艺者，周公之旧典也，即

周官之秘籍也。或谓西周之时,太卜司易,宗伯掌礼,司乐典乐、太师陈诗,不知此就职守言,非指书籍言也。六艺掌于史官,宣尼删定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8]11}又“周代成周,史官职守孔多,溯厥源流,共分三派。一曰六艺出于史也……二曰九流出于史也……三曰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也”^{[8]10-12}。且为列表以明之。推衍天下学术大势为“九流出于史官”,而其高于前贤之处则在于缘巫论史:史分为二,司天事与司人事。司天事者为巫祝,其一,司祝(墨);其二,司历(阴阳、术数)。司人事之史:其一,掌技艺之史(凭虚:五行、天文、龟占、形法。征实:历数、医、农、兵乐);其二,掌道术之史(儒掌六艺:易、诗、书、乐、礼、春秋。师掌诸子:小学、儒、道、名、法)。刘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凌迈前贤。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为之纲领:“昔欧西各邦,学校操于教会。及十五世纪以降,教会寝衰,学术之权,始移于民庶。及证之中邦典籍,则有周一代,学权操于史官。迨周室东迁,王纲不振,民间才智之士,各本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家之言……及孟坚作《汉·艺文志》……其云流为某家之学,即官师失职,师弟传业之义也。(此会稽章氏之说)是则私学之源出于官学。官学之派主于合,私学之派主于分。”^[9]有周一代学术皆操于史官,自东周官学下移,学在四夷,有志之士各本一己之性而自成一家之言,盖因“私学主分”。“六艺”“九流”“数术方技”三派皆出于史,但儒家不应独尊,刘师培“史自巫出”论足使班固之论偃旗。刘师培曰:“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导之,而尊祖敬宗之说起矣。尊祖敬宗之说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禘之典以兴。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庙祧以设,坛墪以立,祭礼一门,遂为三代之特典。且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史也者,掌一代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吾观古代之初,学术铨明,实史之绩。……学出于史,有明征矣。故一代之兴,即以史官司典籍。试观夏之亡也,太史终古去国;殷之亡也,辛甲抱器归周;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适秦。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8]9-10}初民尊祖敬宗、郊禘之典,

必有典礼法仪,又有太史(卿大夫)奉法仪、载文字而宣之士民。掌一代之学者即史,而掌一国之政教者亦史,史为一代“盛衰所系”及“学术总归”。他说“六艺”之学实始于唐虞,皆故圣王之旧典,岂仅创自周公!唐虞三代之学统于史官,周以后始分专官所辖,九卿司九职,掌九学,衍而为后世之三司六部,所以班固“王官说”也非空穴来风,但只近视而已。刘师培指出“六艺”为太史所载,然上溯唐虞三代,更知“史出于巫”,此远迈章实斋处。

梁启超把从黄帝到夏、商、周(春秋)称为中国学术思想之“胚胎时代”,依《汉志》之道家出于史官而推论说,阴阳讖纬家言常与史相通,因此“胚胎时期”学术思想全在“天人相与”,其枢纽在“祝”与“史”,亦曰学术思想(史)分为祝官天事与史官人事两端。官天事者,司礼、司历(天文历象、阴阳将数、方术占验);官人事者,志事之史(儒)、推理之史(道),与刘氏不同的是,梁氏只列儒道,未及名法。梁、刘皆瞩目“巫史”,可谓目光如炬。梁启超说:“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进之时,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权最重……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达之于天,而祈福祉者也……盖以为祭祀之事,与国家安危大有关系焉。其他百事,皆听命于神,不待言也。二曰司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应用于人事者也,三皇之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盖司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协时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终始五德以定天命也,三曰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古代之学术,半属此类)……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若《诗》,若《书》,若《春秋》,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盖道术之源泉,皆在史。史与祝皆世其官,若别为一族者然。盖当时竹帛不便,学术之传播甚难,非专其业者,不能尽其长也。而史之职,亦时有与祝之职相补助者。盖其言吉凶祸福之道,祝本于天以推于人,史鉴于祖以措于今。”^[10]初民政教不分,颛顼“绝地天通”以降,政教合一,即巫史不分,政教同权,百事问天,然祭祀之事,巫重于史,嗣后尊天事鬼法祖之经验日多,太史逐渐剥离于巫祝,且日益专化,巫事渐次沦落,“究天人之际”已为史官天职。此“太史出于巫祝”乃中华学术之大势。朱维铮以今人之学征

之曰：“无论中外，任何民族，第一代历史家都是巫师，第一种历史记录都是说神与人的关系，第一类历史认识都是神意支配人间的历史观。”^[11]

尽管江琬陷入“尊儒崇道”误区，而关于巫史演变之说，亦与刘、梁契合。古人重祭祀，敬鬼神。初民，宗教与科学皆掌运于巫觋。后世随科学能力渐增又由巫觋衍生史职，史仅为巫其执事之一端而已。上古由敬畏自然与依赖苍天而生巫觋与宗教，由认识自然与企图控制自然而衍生科学。迄于后世，知识日增，知鬼神之事眇漠无凭，于是史盛而巫衰，史夺巫席，巫觋渐次沦为祭祀之配角而祈福医病，不足与史相颉颃。王国维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12]可谓非唯诸子出于巫史，而中华文化泽在巫史。“巫之道，由显而隐……史之道，由隐而之显……近儒所谓‘《六经》皆史’，其实诸子、诗赋、兵书亦皆史也。班《志》谓‘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其实九流之学亦尽出于史官也。班氏所言诸官，在后世虽各有所职，而在古代则皆史之所司。”^{[13]24-25}

庄子指出道术裂变，盖因诸子偏执，荀子也以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道）”，而其学也，始兼诸家。于“六经皆史”与“史出于巫”之外，余英时又有新说，言儒、墨、道三家皆自夏、商、周三代之“礼乐”而来，因三代以降，圣王莫不拜天神以祈福（宗教之源），而其仪式过程则托身于“礼乐”，并指出“礼”出于宗教，“乐舞”为践“礼”之形式。王国维《释礼》说“豊”字，上部象“二玉在器之形”，上古行礼以玉，盛玉以奉神人之器。罗振玉考之“豊”为酒器，亦即礼器。巫师与神祇、祖灵的交通并非随机发生，而是要凭藉某些特定仪礼、仪式与纹以灵异之动物的众多礼器。萨满教或谓原始巫术，而非特指某宗教或信仰。萨满（珊蛮）即巫师通称，凡具萨满经验和萨满行为者，具占星及御天气之功，有预言及解梦之能。其通神之力或为自上帝特赐，或为家世相传、长辈指引梦中神授及精神狂昂之经验。礼乐伴宗教而生，实则出于巫史也，诸论殊途同归。余英时曰：“礼乐源于祭祀，而祭祀则从巫的宗教信仰中发展出来……早期的礼乐是和巫互为表里的；礼乐是巫的表象，巫则是礼乐的内在动力……我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一功能是很多初民宗教所共有的，不必非假定传播论不可。”^[13]

《国语·楚语下》论神话为三期：“古者民神不

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觐，在女曰巫……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即一曰古者“民神不杂”，二曰少皞之衰“民神杂糅”，三曰颛顼受之“绝地天通”。初民畏天尊神，由巫觋而司天命，酋长而司人事，所谓“政教分离”。《尚书·吕刑》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而自颛顼“绝地天通”始，司天理事集一身，巫术沦为附庸，只为既有辩护。殷商尚鬼，上帝主宰下界，咸定人间祸福。王自任“群巫之长”，自御天事，政教合一，是为专制肇始。如神话所示，颛顼藉“绝地天通”以终止“民神杂糅”后，庶民则无权与天直接交通，而由君王本人或其指派的高阶祭司掌管与上帝及其他神祇的交通。巫师本精爽虔敬、智圣明聪，神能附体。颛顼专以亲信司天理事。甲骨文有载商王主宰占卜仪式，并渐成唯一之占卜者和预言者，此谓“神权君主”，《春秋·公羊传》亦载天子专独祭天特权事。天子以“绝地天通”与普世“天人合一”之旨渐行渐远。

四、“礼崩乐坏”神祇式微

周室鉴于商人崇鬼之覆，提出“以德配天”之“天命转移”观，君权虽神授，而须礼天爱民，因天（上帝）不专属君上，乃普天共神，不以德配之，天将它属，此谓“天佑民生”，民心即天下，故“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天命所在，“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礼乐”由宗教司天而转型社会伦理，由娱神到化民，史官遂脱颖巫祝。往古君权神授，虽周室“以德配天”而终未脱却天命与宗法浑然一体，终未脱却人欲与特权相得益彰而礼崩乐坏。神权始于无知，成于愚民，间以御君，终以愚民。至西学东渐，无论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而圣训为纲，人治为体，难以自弃，则世随君之明暗而沉浮，民随官之清浊而哀乐。礼乐文化始于“事神”，崩于“事人”，虽周公而未及始料。轩轾儒道，意在明《六经》与巫史之关系，意在上溯“道术”渊源。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

谓不外二种,即“语学的”与“史学的”。而许慎、罗振玉、王国维诸家注重考释文字源流其不外其职业类型与名称,皆未及思想源流。史学法则注重制度之发生与变化,“六经皆史”论者之于源流考论更近宏旨。此外,陈来提出“思想史”方法,似为当下学者共识,故以史为杆,以思想为权,或为通衢。

参考文献:

- [1] 江琰. 读子卮言[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
- [3] 李贽. 焚书·续焚书[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258
- [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上[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5] 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 文献丛刊·新编汪中集[M]. 扬州:广陵书社,2000:384-387
- [6] 龚自珍. 古史钩沉论[M]//龚自珍. 龚定庵全集(续集卷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3
- [7] 章太炎.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3:88
- [8] 刘师培. 古学出于史官论[M]//刘师培. 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9] 刘师培. 周末学术史序[M]//刘师培. 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8-59
- [10] 梁启超. 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6-208
- [11] 朱维铮.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
- [12] 王国维. 释史[M]//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六. 北京:中华书局,1959:269
- [13] 余英时. 论天人之际[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25

(责任编辑:刘 鑫)

声 明

1. 本刊已许可相关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

2. 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本刊编辑部